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研究

——基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分析

陈澳¹ 赵一夫²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基于安徽省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双视角出发,构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计量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2)异质性分析发现,主动返乡群体乡村治理参与意愿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且在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表现上存在影响差异;(3)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资本在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及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这一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当两者协调发挥作用时,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会得到显著提升。据此,研究提出进一步优化村庄社会发展环境、激活个体资本要素活力、提升基层政权治理效能,以激励和吸纳返乡群体有序参与乡村治理。

【关键词】:资源禀赋认知 个体资本差异 返乡群体 乡村治理 参与意愿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22)010-0069-014

DOI: 10.19631/j.cnki.css.2022.010.006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延伸,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更是稳固党在农村基层执政根基的关键手段。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原先分散、封闭且以“乡土生活”为主的自然村落共同体遭到解构,村庄社会整体呈现出“空心化”“边缘化”等现象,传统村庄“全能治理”模式失灵。尽管乡村自治实践探索活跃,但村民主体意识认知模糊且权力虚化,组织形态社会参与效能和制度规则规制能力日趋弱化,造成村庄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发育缓慢,严重钳制乡村自治的活力迸发。返乡群体作为城市发展和乡村变化的双重经历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具有天然的故土情结,而常年城市务工经历又使他们能较为准确把握村庄建设的局限性和真实需求,引入该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是个人价值的再实现,更是乡村建设的社会价值再回归,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治理有效。

当前,学者们围绕乡村治理已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在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及其治理效能上,村干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乡村治理与发展”(10-IAED-06-2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2019MZD009)。

作者简介:陈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赵一夫(通信作者),管理学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部治村首先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因其既处于科层体制基层，又位于乡土社会之中，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其往往会选择做村庄政治的维持者和秩序的被动守护者^[1-2]。其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货币化的弊端，亦有提升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3]。最后，乡村灰色势力治村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国家寻求有效治理力量的需求，能够节约协商和治理成本，但会带来乡村治权的弱化、村庄高密度利益的受损^[4]。在参与乡村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上，个体特征层面上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政治身份、接受培训、流动范围、工作稳定性等均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前因变量^[5-6]；路径机制层面上“新乡贤”治村、“集体经营”决策、“三治融合”发展等模式对提高村民治理参与度具有积极影响^[7-9]；村庄禀赋层面上村庄文化供给、人居环境整治、社会资本整合^[10-12]亦是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是其个体价值实现及再创造的过程，同样对其当期及未来的家庭决策产生影响，而村庄内在资源禀赋条件及其个体资本掌握情况又进一步决定着该类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值。

（一）资源禀赋认知对返乡群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资源禀赋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决策研究的根源性因素之一^[13]。具体来看，村庄资源禀赋主要指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人文社会条件^[14]，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层面，内生性和外生性层面^[15]，可以涉及区位交通、工业基础及外部性的市场需求。村庄的资源具有稀缺性，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村庄异质性的形成，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禀赋的差异^[16]。认知是返乡群体经由意识活动而对获取的知识进行识别、加工和应用的过程^[17]。不可否认，参与乡村治理能够满足个人自我实现的需求，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作为一般“经济人”，返乡群体更倾向于综合各方面认知去判别和权衡所作决策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村庄资源禀赋作为组织成员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18]，在村民日常决策中，主要通过影响要素处置方式来对决策人产生影响^[19]。因此，对村庄资源禀赋的认知程度，能够决定劳动力是否愿意作出返乡决策，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乡村治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有关村庄资源禀赋认知的假设：

H1：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二）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个体资本是个体所掌握的综合技能和可供自我支配的资源总和，主要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构成^[20]。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资本差异影响劳动力的行为决策^[21]，只有拥有最低限度的资本状况，个体才有从事某项社会实践的行为动机^[22]。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自身资本现状的约束。具体来看，人力资本是个体知识储备和领导能力的体现，外出务工可作为对返乡群体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其具备参与村庄日常事务管理的能力与优越条件。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个体的关系网络，不可否认，多年离乡经历使得返乡人员原有的乡土网络变得脆弱，不利于其利用“熟人圈子”展开治理^[23]；但与此同时，返乡群体在务工地构建了更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且处于该种网络节点的组织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更高，资源调配能力更强^[24]，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正向辅助作用远远高于村庄社会资本降低所带来的负向影响。经济资本是货币或者产权的表现形式，返乡群体的经济资本一般高于留守村民，更注重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主观上愿意为提高村庄繁荣度付出努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有关个体资源禀赋认知的假设：

H2：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三）返乡群体对村庄发展的影响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人们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返乡群体与村庄发展的关系上，返乡

群体在经过系统性学习、专业化培训后，实现了非农职业转换，其回流行为不仅能有效填补村庄人口外迁造成的劳动力缺口^[25]，也能为村庄非农经济的发展注入经济和社会资本。同时，返乡群体作为“乡村精英”群体，具有更新的发展理念和创新精神，可通过技术和价值观的传递为村庄发展提供机遇^[26]。但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认为劳动力回流属于人口的逆向迁移，会造成村庄劳动力的冗余。一方面，他们被看作“失败的冒险者”^[27]，因缺乏市场竞争力而被城市淘汰，将是阻滞村庄发展的“包袱”；另一方面，劳动力回流，极易引起土地权属问题并发生利益纠纷，严重影响村庄社会治安^[28]。本文认为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未根据劳动力返乡缘由进行分类，劳动力选择返乡是基于个体和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受到来自城市推力和村庄拉力的双重作用。本文认为，基于村庄拉力作用以积极心态返乡的劳动力属于“主动返乡”群体；而主要遭受城市推力以消极态度返乡的劳动力则被认为是“被动返乡”群体^[29]，两类群体对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参与意愿和作用发挥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有关返乡群体的研究假设：

H3：返乡群体可根据特征分为“主动返乡”与“被动返乡”群体，其中，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要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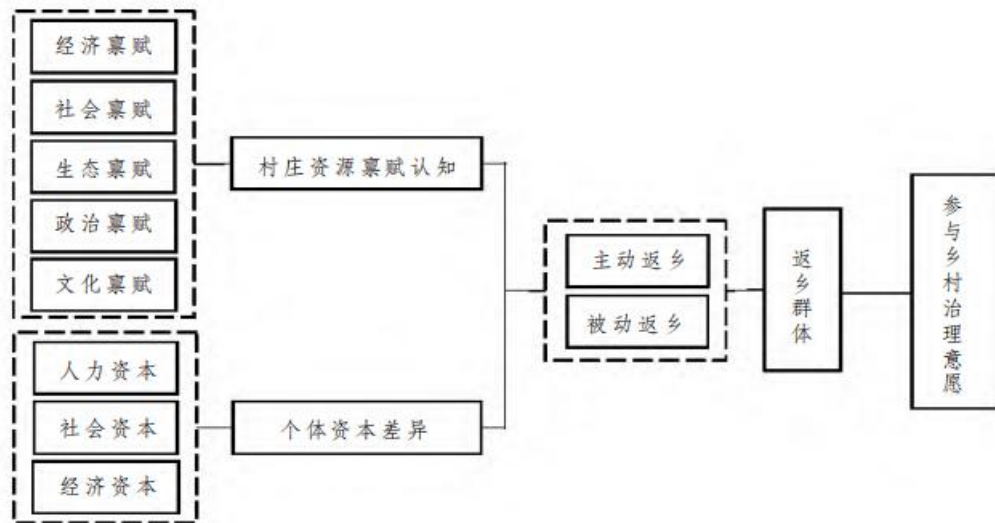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使用回归模型，设立新的变量体系来构建农户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研究框架，具体的研究涉及过程可以分为四步：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和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8—9月在安徽省展开的关于乡村振兴村民意向专项调查。选择阜阳、蚌埠,合肥、六安、芜湖、宣城6市,调查区域覆盖皖北、皖中、皖南地区,具有较好的区域代表性。调研涵盖土地市场、家庭生产、乡村产业、人居环境、村庄建设等内容,采用PPS抽样,在每个市抽取2个县区,每个县区抽取4个样本乡镇,每个乡镇抽取2个行政村,行政村层面根据人口规模与集中度随机抽取20~35户村民;调查人员通过入户访谈与填表记录的形式,共计回收样本2618份,其中有效问卷2347份,有效率达89.65%。

(二) 变量选取

1. 返乡群体界定

在微观层面上,村民的流动经历可根据调查问卷中“您是否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予以测度,当受访村民回答“是”,则可视作返乡群体,反之为村庄留守劳动力;在此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30],将主要受农村拉力影响而作出返乡决策的劳动力视为“主动返乡”,主要受城市推力影响作出返乡决策的劳动力视为“被动返乡”,此处根据返乡群体的“返乡缘由”进行分类判别。在问卷题项设置中,将“厌倦城市生活”“准备返乡创业”“乡土情结浓厚”等返乡缘由视为主动返乡的判别依据,将“年老体衰、容易生病”“需要照顾老人孩子”“薪资不高、工作不稳定”等返乡原由视为被动返乡的判别依据。

2. 被解释变量

人居环境是乡村社会最大公共品,相较于其他的村庄治理工作,人居环境整治易于上下联动、多元参与。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代表的生态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考核指标。同时,学者研究认为,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组织抓手,再造适宜原子化村庄的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机制,客观激活了村民自治能力,实际推进了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31-32]。其次,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给村庄带来了组织化程度提高、公共议题增加、自治制度创新、利益联结增强等叠加效应^[33],客观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为此,本文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切入,选择“是否愿意集资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作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被解释变量。

3. 核心解释变量

(1) 村庄资源禀赋认知

返乡群体基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并对照乡村振兴政策目标,对当下最迫切的乡村治理工作有较理性的选择以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参考。具体来看,经济禀赋认知源于个体对村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比较优势的综合研判,立足于农业生产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16],在问卷中以问题“您认为本村最适合发展的产业类型”来表征。文化禀赋认知依托于个体对村庄历史文化资源和传统村落信仰价值的认识 and 把握,体现着返乡群体对村庄文化治理的思考^[34],在问卷中以问题“您认为本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方向”来表征。返乡人员的生态禀赋认知是在对村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感知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心理认知,从而反映其对村庄生态治理的态度偏好^[35],以问卷中“您认为本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应在哪方面”予以表征。政治禀赋认知是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的对治理质量的主观评价,包含基于过程的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等四个维度^[36]。调查问卷分别设置了6个认知题项,经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和因子分析后,剔除“村民代表大会参会率”“村级财务透明度”两个题项,提取出1个主成分并命名为“政治效能感”。本文中它特指公众对政府所提供服务内容的主观态度,用来反映返乡群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政府对其诉求和意见的重视程度。社会禀赋认知体现在返乡群体对村庄社会结构、组织、个

人的信任感知上,被广泛运用于个体行为意愿研究^[37],调查问卷设置了“您对周边邻里、亲朋、同组成员、村委、乡镇政府、信访部门信任感知度”等6个题项,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和因子分析后提取出2个主成分,此处参照陆渊的研究^[38],可分别根据信任主体类别命名为“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

(2) 个体资本差异

本文将个体资本差异划分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中。在人力资本维度,参照张斌的研究选取文化程度、是否接受培训作为测量指标^[39];其中,文化程度根据“受教育年限”用连续变量表示。在社会资本维度,参考黄敦平的研究选取社会网络、社会经验和社会参与为衡量指标^[40];其中,社会网络用以反映返乡人员的人际关系结构,以“愿意一次借5万元人数量”表征,社会经验描述返乡人员的人生经历和处事技能,以“全年非农工作天数”表征,社会参与反映返乡人员对村庄社会的融入程度,以“是否参与组织活动”表征。在经济资本维度,结合乡村实际,返乡群体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应当包含承担非预期损失的财富收入和利于家庭生计的自然资源两部分,为此,借鉴张翠娥、杨悦等学者的研究,选取非农经营收入、承包耕地总面积作为衡量指标^[5, 41]。

4.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结果发现个人和家庭特征会对村庄劳动力生产决策产生影响^[42]。因此,在综合考虑后,本文选取返乡群体的性别、年龄、是否党员户、非农流动范围作为控制变量,一并纳入分析。

(三) 描述性统计

根据上文对相关变量的定义,本文经初步筛选,获取返乡群体总样本1617份,其中“主动返乡”样本953份,“被动返乡”样本664份。表1是返乡群体总样本的简单描述性统计,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初步得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整体意愿较高,其中愿意通过集资助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宜居水平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65.80%;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返乡群体对所在村庄产业发展类型的界定中,现代种养业、新型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的样本占比分别为65.32%、24.04%、9.40%、1.24%,对村庄文化振兴的方向认知中,制度文化、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选择样本比例依次为36.38%、27.58%、24.36%、11.68%;关于生态禀赋认知,受访人员认为应着重提升村庄自然系统、居住系统、社会系统和支撑系统来达到人居环境整治目的的样本比例依次为60.12%、29.85%、7.81%、2.22%。

(四) 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用调查问卷中“是否愿意集资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表征,属于典型的二元分类变量,应当选择二元Logit模型予以分析,其基本形式为:

$$\text{logit}(P)=\ln\left(\frac{P}{1-P}\right)=\beta_0+\sum_{i=1}^p\beta_ix_i+\varepsilon \quad (1)$$

式(1)中,P表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程度,p/(1-p)表示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发生概率比;x_i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返乡群体对村庄资源禀赋的各维度认知变量,返乡群体个体资本变量;β_i是自变量的系数,β₀为常数,ε为随机干扰项。

三、结果与分析

鉴于前文已设定完成相关指标体系，接下来即可通过构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与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间关系的计量模型，检验两类核心解释变量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并根据基准回归、异质性分析、调节作用检验衡量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效应。

(一)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分析

首先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发现变量中最大方差膨胀因子小于 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消除变量间的自相关性，将控制变量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逐步纳入模型，建立了包含 4 个二元 Logit 回归的嵌套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2。其中，模型一属于基准回归，投入的变量仅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党员户、流动范围等控制变量；模型二、模型三分别纳入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的测量变量；模型四则将所有测量变量全部纳入模型展开分析

表 1 变量说明及简单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赋值	均值
被解释变量			
参与乡村治理意愿	1 是否愿意集资参与乡村人居	愿意二 1, 不愿意二 0	0.6580
核心解释变量			
村庄资源禀赋认知			
经济禀赋	产业发展类型认知	现代种养业=1; 新型服务业=2; 农产品加工业=3; 休闲旅游业+4	1.4656
文化禀赋	村庄文化振兴方向	制度文化=1; 物态文化=2; 行为文化=3; 心文 化=4	2.1134
生态禀赋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重点	自然系统=1; 居住系统=2; 社会系统=3; 支撑 系统=4	1.5213
政治禀赋	村民政治效能感	满意度由低至高 1~5	4.0402
社会禀赋	人际信任	信任度由低至高 1~5	4.0619
	机构信任	信任度由低至高 1~5	2.9505
个体资本差异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数	7.0167
	是否受过培训	是=1; 否=0	0.3806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愿意借 5 万元人数	5.7962
	社会经验	全年非农工作天数	204.5509
	社会参与	是否参与组织活动	0.2463
经济资本	非农经营收入	非农工资对数	4.2562
	承包土地面积	承包地亩数	5.8664
控制变量			
性别	\	男=1; 女=+0	0.6863
年龄	\	村民当年实际年龄	45.2126

是否党员户	\	是=1; 否=0	0.2896
非农流动范围	非农务工地点	本乡镇=1; 县内=2; 省属地级市=3; 外省=4; 境外=5	1.5903

从村庄资源禀赋认识看, 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文化发展方向(心态)、人居环境整治(社会)、人际信任等变量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有明显影响, 且分别通过了模型二与模型四的显著性检验, 假设 H1 基本得到验证。其中, 发展新型服务业更加契合返乡群体回乡创业需求, 有助于吸纳其参与村庄新业态的管理与决策, 发挥其社会资本价值。培育以健康文明心态为支撑的村庄文化, 同时注重人居环境整治的宣传引导和社会监督工作, 能够显著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和环保意识, 客观降低了乡村治理的阻力和复杂性, 有利于提高返乡群体的乡村治理意愿。在村庄政治禀赋和社会禀赋认知上, 从模型二结果来看, 政治效能感、机构信任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加入个体资本差异变量后, 只有人际信任在 10% 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个体资本的积累最先形塑的是返乡群体的人际信任值, 而人际信任同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和表达诉求的前提保障。从个体资本差异看, 文化程度、是否受过培训、社会参与和承包土地面积等变量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有显著影响, 且分别通过了模型三与模型四的显著性检验, 假设 H2 完全得到验证。其中, 具有文化素养和培训经历的返乡群体能力“倍增”效应更为明显, 政府和地方群众迫切希望他们参与乡村治理, 并给予他们各项优待与支持。有组织参与经历的返乡群体之间往往存有一个共同利益体, 为维护集体利益, 他们愿意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承包土地面积越多, 返乡群体越倾向于参与乡村治理, 这一点符合村庄实际情形, 因承包地面积越大, 生产要素和成本的投入越多, 而乡村治理本身必然会涉及土地问题, 这与返乡群体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表 2 模型回归结果

变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			1.152***	0.479			1.019**	0.485
产业发展类型(农产品加工业)			0.399	0.520			0.376	0.566
产业发展类型(休闲旅游业)			-0.136	0.484			-0.125	0.502
文化振兴方向(物态)			0.723***	0.269			0.467	0.381
文化振兴方向(行为)			0.864***	0.296			0.598	0.365
文化振兴方向(心态)			1.611***	0.588			1.727**	0.814
人居环境整治(居住)			0.483*	0.277			0.425	0.291
人居环境整治(社会)			1.479**	0.739			1.635**	0.774
人居环境整治(支撑)			-0.791	1.716			-0.653	2.265
政治效能感			0.445***	0.157			0.272	0.263
人际信任			0.384	0.295			0.351*	0.187
机构信任			0.215*	0.130			0.173	0.112
文化程度					0.053*	0.031	0.067***	0.023
是否有培训经历					0.495**	0.199	0.572**	0.269
社会网络					0.053	0.037	0.069	0.045
社会经验					0.027*	0.016	0.033	0.020
社会参与					0.177**	0.084	0.224**	0.095
非农经营收入					0.868	0.534	0.737	0.463

承包土地面积					0.069**	0.030	0.152**	0.063
性别	0.233***	0.042	0.214**	0.108	0.238**	0.113	0.446***	0.172
年龄	0.034***	0.006	0.031***	0.011	0.045**	0.021	0.081***	0.027
是否党员户	0.442***	0.124	0.877***	0.286	0.424**	0.215	1.529***	0.469
流动范围	-0.116**	0.056	-0.081*	0.045	-0.107**	0.049	-0.446**	0.218
常数项	-2.582		-2.898		-3.227		-5.315	
PseudoR方	0.183		0.204		0.237		0.317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从控制变量看，在模型一至模型四中，性别、年龄、是否党员户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非农流动范围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分析认为，外出劳动力在经历对传统村落的“脱离”后，流动范围越远，其返乡后对村庄社会的认同度就越低，从而造成行为上的边缘化，逐渐疏离村庄治理事务。

（二）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上述实证检验基础上，将返乡群体划分为主动返乡与被动返乡两个类别群体，分别建立模型五和模型六，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别的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程度，结果见表 3。对比模型四与模型五，发现文化振兴方向（行为）、人居环境整治（居住）、政治效能感、社会网络四个新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对提高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村庄良好行为文化的养成本身能够吸引劳动力主动回流，通过规范生产、生活等行为举止调动起返乡群体参与治理的主动性。改善村民住房条件和房前屋后生态环境能够促使主动返乡群体产生“自家人”的强烈归属感，并激发其“亲社会”的行为动机。除此之外，外出劳动力主动返乡后，必然也十分在意自身的政治地位与诉求表达对村庄决策的影响力，进而决定其愿意在乡村治理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表 3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异质性检验

变	模型五（主动返乡）		模型六（被动返乡）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	1.206**	0.582	1.079**	0.515
产业发展类型（农产品加工业）	0.362	0.520	0.727	1.220
产业发展类型（休闲旅游业）	-0.075	0.484	0.637	0.785
文化振兴方向（物态）	0.576	0.369	0.577	0.416
文化振兴方向（行为）	1.196**	0.563	1.167**	0.532
文化振兴方向（心态）	1.611***	0.588	1.065	0.932
人居环境整治（居住）	0.613**	0.280	0.582	0.407
人居环境整治（社会）	1.505**	0.739	2.438**	1.218
人居环境整治（支撑）	-0.454	1.716	-1.012	1.329
政治效能感	0.187**	0.087	0.390	0.278
人际信任	0.206**	0.101	0.262	0.238
机构信任	0.401	0.260	0.440	0.274
文化程度	0.160**	0.066	0.102***	0.032
是否有培训经历	0.472**	0.198	-0.261	0.364

社会网络	0.088*	0.051	0.044	0.040
社会经验	0.023	0.017	0.014	0.013
社会参与	0.177***	0.065	0.247	0.374
非农经营收入	1.108	0.736	0.389	0.478
承包土地面积	0.067**	0.030	0.066	0.062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4.198		-1.037	
PseudoR 方	0.196		0.142	

注: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对比模型四与模型六,可以发现,相较于总体返乡群体和主动返乡群体,被动返乡群体整体的乡村治理参与程度不高,仅有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文化振兴方向(行为)、人居环境整治(社会)、文化程度等原先几个变量通过检验;从回归系数比较来看,各显著性变量对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促进程度也要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分析认为,被动返乡群体在主观上还是倾向于在城市发展,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现实状况的无奈而不得已返乡,加上返乡者本身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对村庄社会的依赖程度已大为降低,导致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不够。因此,假设 H3 检验得到通过。

(三) 个体资本差异对政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值得讨论的是,政治效能感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影响并不完全显著,这一结论与实际情况相违。在个体认知中,政治效能感是效能信念的一种体现,是主观规范的基础^[43]。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意愿的强弱受到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而资本、机会、能力均能通过影响感知某项行为执行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意愿的强弱程度^[44]。因此,在返乡群体有序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其参与意愿形成的强劲外在动力,而个体资本差异则是参与治理必要的内部约束条件,即个体资本可能会在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及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这一关系路径中产生调节作用。为此,本文首先将个体资本差异的 7 个细分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次对各维度指标均等赋权,得出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综合评价,通过分别构建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与个体资本综合评价变量的交互项,逐一纳入模型七、模型八、模型九进行拟合,以验证调节作用。

表 4 个体资本和政治效能感交互项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

变	模型七		模型八		模型九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产业类型	1.174*	0.653	1.000	0.625	0.988	0.628
文化发展方向	1.959**	0.887	2.067**	0.949	1.937**	0.839
人居环境整治	1.115	1.022	0.649	1.011	0.347	1.006
政治效能感	0.601	0.421	0.367*	0.213	0.168	0.234
人际信任	0.426**	0.211	0.378*	0.205	0.331	0.207
机构信任	0.302	0.196	0.189	0.179	0.198	0.176
文化程度	0.400***	0.099	0.023	0.028	0.034	0.030
培训	1.719	1.424	0.730***	0.244	0.702***	0.252
社会网络	0.006	0.006	0.008	0.019	0.007	0.006
社会经验	0.209***	0.055	0.106	0.253	0.248*	0.128
社会参与	0.182	0.246	-2.536*	1.404	0.174	0.261

非农工资收入	0.187	0.151	0.147	0.148	0.193	0.163
承包土地面积	0.094**	0.039	0.078**	0.037	-0.487***	0.141
政治效能感*人力资本	1.904***	0.429	—	—	—	—
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	—	—	0.684**	0.339	—	—
政治效能感*经济资本	—	—	—	—	6.754**	2.6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1.025		-2.455		-4.969	
PseudoR 方	0.396		0.407		0.452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如表 4 显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政治效能感的交互项至少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在个体资本差异的调节作用下，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重新发挥了作用。分析认为，当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达到自身期许值后，则更在意个体资本对其参与乡村治理所能产生的影响效能。其中，人力资本能反映个体对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回应程度，有助于降低其治理参与难度；社会资本利于提高政治收益，有助于降低其治理参与成本；经济资本则是返乡群体参与治理的有效保障，能增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因此，只有将政治效能感发挥的外在动力与个体资本产生的内在约束力结合分析，才有助于展开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研究。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回归模型，深入探究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第一，返乡群体对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存在多处共识之处，产业发展类型、文化振兴方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人际信任是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前较为关注的议题；第二，在返乡群体个体资本组成中，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社会经验、社会参与和承包地面积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第三，异质性分析检验发现，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反映在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表现上存在显著不同；第四，个体资本差异在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这一路径中存在调节效应，只有两者协同发展，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才能得到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优化村庄社会发展环境。一是通过支持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鼓励各类返乡人才参与村庄新业态管理，对具有一定影响力、愿意扎根农村基层的返乡群体，要注重解决其回归后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二是应持续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村庄移风易俗，引导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从而降低返乡群体治理参与难度；三是做好人居环境常态化监督和社会宣传工作，集中开展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激发主动返乡群体产生“亲社会”的行为动机；四是通过强化政策支持和舆论引导增进返乡群体对“信任互助”“团队合作”的认知，唤醒被动返乡群体的村庄归属感；五是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信任及其规范体系和保障机制，维系“乡土信任”关系，以便进一步利于“熟人圈子”展开治理。

第二，激活个体资本要素活力。一方面，健全返乡群体人力资本信息系统，准确抓取返乡群体的技能、专长、意愿等信息，引进一批返乡创业能人，充分利用返乡人才的社会资本优势，通过其人格魅力和影响力来构建公众参与网络，提升村级公共事务决策能力，促进乡村“吸引”和“留住”一定的劳动力^[45]；另一方面，要在现有返乡群体中发现一批年轻有为的“新乡贤”带头人，吸纳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年轻群体进入村“两委”班子参与基层组织建设，鼓励他们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发挥建设性作用，尝试增设“新乡贤”主题培训班次，通过有组织的培训和轮训，提高返乡群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增强对党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把握能力。

第三，提升基层政权治理效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协商机制，通过搭建对话平台拉近干群关系，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村干部为民服务能力。首先，明确议事协商主体，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询问等多种方式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参与权利。其次，加强对公众宣传教育，在增强其对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理解的同时，提高表达能力，增强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最后，应结合乡村社会矛盾的特征及其治理方式，重视政治效能感增强与个体资本差异整合后的叠加效应，通过发展社会治理协会、乡贤理事会等民间组织，广泛征求返乡群体的意见建议，提高返乡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凝聚其作为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共识，增强返乡人员参与治理的意愿。

参考文献

[1] 张雨薇, 武晋. 任务型经纪: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范式——基于桐乡“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6): 42-51.

[2] 付英. 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 154-163+11.

[3] 陈文琼. 富人治村与不完整乡镇政权的自我削弱?——项目进村背景下华北平原村级治理重构的经验启示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 (1): 29-43.

[4] 杨述明, 张明. 破解乡村灰色势力治理困境 [J]. 社会治理, 2016 (2): 109-114.

[5] 张翠娥, 李跃梅, 李欢. 资本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基于 5 省 1599 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6 (1): 27-37+50.

[6] 王轶, 赖德胜.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者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 (4): 56-63.

[7] 倪咸林, 汪家焰,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新乡贤治村”: 乡村社区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策略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 (5): 82-90.

[8] 杜鹏.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集体经营机制: 类型与比较——基于村庄治理能力的视角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52-63.

[9] 张明皓, 豆书龙. 党建引领“三治结合”: 机制构建、内在张力与优化向度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32-41.

[10] 李永萍. 村庄公共性再造: 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福建省晋江市 S 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3): 72-82.

[11] 颜廷武, 何可, 张俊飏.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1): 158-164.

- [12] 许焱, 申鲁菁. 社会资本整合与治理效能提升: 乡村善治的逻辑路径——基于浙江的经验研究[J]. 浙江学刊, 2021 (4): 35-41.
- [13] 叶林, 邱梦真, 梁托. 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目标偏差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7 (4): 78-87.
- [14] 李灿, 吴顺辉, 李景刚.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基于 575 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4): 542-551.
- [15] LONG H L, ZOU J, LIU Y S.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9, 33 (4) : 454-462.
- [16] 于水, 王亚星, 杜焱强.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4): 52-60.
- [17] 宋连久, 刘天平, 孙自保. 资源禀赋、认知、制度环境与市民化意愿研究? ——以西藏为例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5): 802-810.
- [18]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 [J]. 社会学研究, 2012 (3): 157-181+245.
- [19] 刘达, 韦吉飞, 李晓阳. 人力资本异质性、代际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2): 58-68+192.
- [20] 田逸飘, 张卫国. 资源禀赋、能力水平与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基于武陵山区建档贫困户的调查分析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 (11): 109-117.
- [21] 创业理论的演进脉络——创业研究的创业者异质型人力资本实现视角提炼 [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0 (1): 60-67.
- [22] 李芬妮, 张俊飏, 何可. 资本禀赋、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100-107+182-183.
- [23] 田经綦. 返乡农民工家乡认同感实证研究——以湖北省宜昌市 Z 县 M 乡为例 [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 [24] 黄晓勇, 刘伟, 李忠云, 等.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6): 66-72.
- [25] 任远, 施闻.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J]. 人口研究, 2017 (2): 71-83.
- [26] 石智雷, 谭宇, 吴海涛. 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与创业意愿研究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11): 13-23.

- [27] 周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 [J]. 农业经济, 2020 (3): 81-83
- [28] 黄振华. 农民工返乡和留乡的基本态势与特征分析——基于全国六省十村数据的实证研究 [J]. 财经问题研究, 2009 (7): 109-113.
- [29] 付翠. 农村劳动力回流、人力资本与家庭农场培育——基于 CLDS2016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新疆农垦经济, 2021 (9): 33-43.
- [30] 姜姝.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归”群体的生成机制及其价值实现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3): 140-147.
- [31] 周冲, 黎红梅. 村民感知与意愿响应视角下的后疫情时代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路径分析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 (5): 654-662.
- [32] 黄振华.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执行进展与绩效评价——基于 24 个省 211 个村庄的调查分析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54-62.
- [33] 龚城, 赵松林, 金丹, 等.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的阶段性综述与进路探讨 [J].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0 (1): 63-67.
- [34] 何艳冰, 张彤, 熊冬梅.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及差异化振兴路径——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 [J]. 经济地理, 2020 (10): 230-239.
- [35] 林丽梅, 何秀玲, 韩雅清. 生态认知、关系网络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的影响: 基于福建省 501 份村民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1 (10): 1301-1309.
- [36] 金炜玲, 孟天广. 公众参与、政治价值观与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基于 2015 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数据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1 (1): 44-57.
- [37] BANDURA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 (1): 21-41.
- [38] 陆渊, 张新文.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4): 552-560.
- [39] 张斌, 孔欣悦, 但雅. 人力资本、种植结构与粮食安全——基于全国 31 个省 (市、区) 3073 个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71-79.
- [40] 黄敦平, 方建. 资源禀赋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J]. 人口学刊, 2021 (5): 67-75.
- [41] 杨悦, 马超群, 徐和平, 等. 产业扶贫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1 (9): 92-101.
- [42] 郑广瑄. 政绩评价如何影响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意愿——来自辽宁省的经验证据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 (10): 64-79.

[43] 陈升, 卢雅灵.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 (2): 16-30.

[44] 白永亮, 程奥星, 成金华.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意愿——5个国家级试点城市的1379份问卷调查 [J]. 资源科学, 2019 (8): 1427-1437.

[45] 秦中春, 李青. 我国乡村治理的政策演变与未来取向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1.